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

# 唱片与近代 上海社会生活

葛涛著



CHANGPIANYUJINDAI  
SHANGHAI  
SHEHUI SHENGHUO

---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

# 唱片与近代 上海社会生活

葛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葛涛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2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 - 7 - 5326 - 2696 - 0

I. 唱... II. 葛... III. 唱片—文化史—上海市—近代

IV. G23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203 号

责任编辑 解永健

封面设计 姜 明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http://www.ewen.cc) [www.cishu.com.cn](http://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01 000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696 - 0/K · 606

定价: 46.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sup>[1]</sup>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祆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薮,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ander,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 70 页。

# 序 言

熊月之

人类信息记录史上,留声机的发明,是继照相机之后又一革命性变革。从此,长风之浩浩、流水之淙淙、奔马之嘶嘶、战炮之隆隆、小鸟之啾啾、老鼠之吱吱、伟人之南腔北调、名角之千古绝唱、政敌之私语、情人之山盟、父祖之遗嘱,一切来去匆匆、无质无形之天籁、地籁、人籁,一切或强或弱、或长或短之轰然、哗然、嘻嘻、哈哈、号啕、呜咽之声,都可录之一瞬,存之永久。

留声机自 1877 年发明以后,很快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留声机以及唱片、录音机的使用,在相当广阔的范围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信息传递、课堂教学、案件审理,一切与声音有关事情的处理方式,都可能因此而改变。特别是唱片,对于推广与普及音乐、扩大戏曲曲艺影响、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其功至伟。

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留声机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唱片制作与销售中心。留声机与唱片,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先后被赋予多重意义,诸如奇技淫巧、奢侈物件、高雅标志、谋利商品、宣传利器等。“留声机”的名字是 1890 年由上海人叫开的;近代中国第一批唱片是 1903 年在上海灌制的:弄堂里飘出留声机播放的靡靡之音,是老上

海的特别风情；一曲《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使上海历史文化名城色彩更为亮丽。从经济角度看，唱片业曾是上海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诚如本书所述：

作为中国唱片业中心，上海发行的唱片种类繁多，内容异彩纷呈。就戏曲唱片而言，除了京剧之外，昆曲，以及全国各地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戏曲均有发行。就歌曲唱片而言，既有时代曲，也有抗日救亡歌曲；既有创作歌曲，也有各地民谣。就乐曲而言，即有传统国乐，也有中西合璧的新作之曲。1949年之前上海发行的唱片，可谓同时代中国音乐、戏曲艺术的原声宝库。

一粒砂中看世界。通过唱片与留声机，可以看到上海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上海与中国内地的联系，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可以了解上海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上层与下层的差异，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葛涛博士选择唱片为切入点来研究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我很赞同。他以前做过照相与近代社会的研究，熟悉西方器物输入中国的历史，熟悉学术界关于器物文化的研究动态，因此，进入此课题，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他从报刊、档案中搜集了相当丰富、具体、生动的资料，还作了一些社会访谈。全书叙述了留声机、唱片发明、产生的历史，传入中国的历程，多侧面地研究了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关系，既有面上的扫描，也有点上的深掘，对于百代公司的剖析具体而微，很见功力。书中对于唱片的社会功能着墨尤多，如唱片与国语教学、外语教学、判案证据、商业广告等，由此可见作者视野之开阔。书中揭示的唱片经营之道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英商谋得利公司作为上海经营唱片业最著名的公司，其生意经中最重要一条是西方硬件、中国内容，即在上海本地请著名演员灌

音,道地的中国内容,如京剧、徽曲、粤剧、昆曲、梆子、各省小曲等,灌音以后送到英国加工成片,再返回上海销售。这样,制作在外国,质量有保证,内容为本土,市场受欢迎。这种以顾客为中心、尽可能使产品内容适应产地文化、注重产品质量的经营之道,相当高明。书中介绍的有些知识,在今人看来,颇有隔世之感。如1935年政府裁定,唱片既非出版物,也非著作物,也没有所谓“专有公开演奏之权”,如何使用唱片,听凭购买者自便,制作者、出售者、发行者均不得干涉。这就意味着电台购买唱片后,可以任意播放,无须向唱片公司支付任何其他费用,也无须向灌录唱片的明星支付酬金。因此,唱片在民国时期上海无线广播电台的节目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这在知识产权无处不在的今天,简直匪夷所思。

葛涛出身书香门第,留学东瀛,归国后因酷爱历史而弃商从文,一头扎进史学园地。他知识面宽,基础厚实,又舍得下功夫,所以进步很快,成果丰硕。披览此书,总的感觉是资料翔实,脉络清晰,分析细致,论述允当,文字也畅达可读。这是一本内容新颖、既有学术性也比较有趣的书。

此书获得上海市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经费资助,依例,作为推荐人我需作一序。然整套丛书我已有一总序在前,故关于研究上海社会生活史的意义在此毋庸赘述,谨草此芜言,以为推荐。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年元月30日

## 前 言

在许多人眼中,唱片无非是一种以供娱乐、消遣的小道具,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都极其有限。以唱片为主要对象,研究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意义,似乎是小题大做。其实不然,这一命题固然无须“大做”,但也并非是一个“小题”。

唱片是声音的载体,可记录和保存声音;它也是声音传播的主要素材之一,借助于各式留声机及广播等媒介,被唱片所记录的声音可以得到还原与传播。探讨唱片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探讨声音的意义。

从源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直至社会生活中所发出的各种声响,人类无法离开声音。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诸多内容,都需要依靠声音进行表达、传播与传承。曾有无数读书人醉心于吟诵诗书,亦有无数士子精通、并严守着代表礼节的音韵;“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歌咏曾使无数贵贱之士趋之若鹜、为之神往。而“三月不知肉味”、“高山流水谢知音”、“振聋发聩”、“振臂一呼”等典故的背后,皆是声音故事的演绎。声音承载与传播了文化、艺术、历史与生活,这种说法丝毫不为过。

不独中国,西方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古希腊城邦中的剧场遗迹,

到空旷苍凉的罗马帝国元老院废墟,直至近代欧美都会中的剧院、音乐厅等,无一不是声音的大舞台,充分彰显了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人类社会是喧闹的,它的绝大多数活动方式都伴随着声音。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直至高雅的艺术领域。这些声音既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也是这两者极为生动的表现方式之一。

声音虽然如此重要,但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却缺乏有效保存的技术手段。虽然通过口口相传、或借助书面典籍等,一些重要的声音形式与内容得到了传承与延续,但这与保留历史的原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留声机和唱片问世以前的数千年内,声音虽然川流不息地承载、传递着文明与生活,但它的初始内容却无法得以保存,许多记载于历史文献的声音遂成绝响,这是文明的一大遗憾。

进入 19 世纪后,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美,人类在记录、复制声音的领域内取得了突破。爱迪生于 1877 年成功制成了世界首台留声机,开启了人类记录、复制声音的先河。此后该领域内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10 年后(1887 年)伯利纳制成唱片,标志着该项技术已趋于成熟与实用。

唱片的问世,首先使一段特定的声音内容能够被精确、完整地记录下来;其次,唱片作为近代工业产品,可以成批量、大规模地进行复制,这也意味着同一声音内容可以得到大量复制。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唱片凭借留声机、广播等工具和媒介,可使所录的声音内容得到传播。尤其是广播,在传播声音方面可谓达到了极致。

可见,唱片的问世使声音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得到了质的飞跃,随之而来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

留声机、唱片相继问世的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在欧洲、北美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亚洲的日本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当时的中

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之后,西方的影响已不可遏制。以按中外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为中心,西方的事物开始源源涌入,其中既有新的制度、新的学术,也有物质文明最直接的体现——器物。

西方近代器物最初进入中国可上溯至明代中晚期开始的中西交流,主要路径有两条:其一,伴随着来华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而来。其二,通过与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贸易而来。通过这两条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器物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军事、民生等方面。以利玛窦为例,他开创了独特的“知识传教”方式,即通过展示、宣传自己所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取得受传对象的好感、信任与尊敬,顺势开展传教。利玛窦曾向万历皇帝进贡精美的自鸣钟,引起了后者极大的兴趣。由此,万历皇帝最终同意了利玛窦留居北京的请求,并给以数额不小的补助。<sup>[1]</sup>利玛窦还曾在广东肇庆公开展出他从西洋带来的各种神奇器物,包括:西洋镜、自鸣钟、世界地图、三棱镜、花边织物、油画圣母像等,当地官员、士绅、乡民争相前往观看,一时称奇。<sup>[2]</sup>

至于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在中西贸易及西器输入中所起的作用,《明史·外国传》中有着详尽描述。当葡萄牙商人于嘉靖年间通过行贿等手段在澳门逐渐定居后,“闽、粤商人,趋之若鹜”,<sup>[3]</sup>争相与之贸易。

通过上述两种路径的西物东渐虽然在明清之际的中西交流史上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却没有使西方器物真正地走进中国社会。造成这种历史困局的原因主要有三条。首先在于传教士们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教义,他们陆续带来、或在中国自制的器物只是借以吸引中国士民、乃至宫廷兴趣,从而打开交流渠道、方便传教的手段。其次,西方器物通过贸易进入中国的道路并不顺畅。自明